

**DANGDAI
ZHONGGUO
ZONGJIAO**



蕭志恬

當代中國
宗親關係
的起源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出版
基金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资助

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

萧志恬

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

萧志恬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5万

1994年9月第一版 199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证(94)第089号

序 言

罗竹风

1952年“老三反”期间，我由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调华东及上海宗教事务处工作，当时萧志恬同志已在，记得他是从华东团校来的。从此开始，连续干宗教工作达45年之久。不幸于1993年11月初去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现状研讨会时，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逝世！惊悉之下，简直不能使人相信这垂耗是真实的；然而他正是这样急促地离开人世，也不妨说是“以身殉职”吧。

1993年9月，我因病住华东医院，曾约定9日去南京开会，车票已由他订好，不料因病未能成行。当他来探望我时，我当面告知去不成了，只好退票。他不禁感叹：总是这样不顺畅，……显得有些沮丧，不知他在想什么！也许是什么不祥之兆吧，万万没有料到，从此竟成永别了。

萧志恬一生坎坷，但他含辛茹苦，埋头苦干，从不诉说个人的忧患。他兢兢业业，努力勤奋，一直在宗教工作的惊涛骇浪中战斗着；“左”的浪潮不断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但他始终全面而又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富有理论勇气，敢于同一切违反政策的错误作法进行斗争，45年来贯彻始终，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在那些以“左”为荣，宁“左”勿右的年代，宗教工作恐怕比其它战线还要“左”三分，而且似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过犹不及，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错误的，只有实事求是，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线，这也是衡量我们工作成绩的客观标志。我认为在这一方面，萧志恬是当之无愧的。

198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不久，萧志恬即由上海市宗教事务局调入研究所工作，并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被评为研究员。同时还成立了上海宗教学会，他担任副会长。两者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堪称模范。十几年来，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倡以集体力量着重研究我国当代宗教问题为主，勇于开拓，卓著成就。当提出宗教应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时，上海宗教所闻风而动，立即付诸实施。通过几百“个例”的分析研究，由主要研究人员分工协作，终于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还继续编写出版了《上海宗教史》和《人·社会·宗教》等学术著作。

萧志恬是有心人，凡是宗教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莫不及时关心，就所了解的范围，迅速写出情况反映和问题所在，除上报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外，还抄报上海市民委、宗教局以及宗教群众组织，供各有关部门参考，起着传递情报，沟通工作的“参谋”作用。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也是值得加以表扬的。

在上海宗教研究所的十余年工作期间，萧志恬更加勤奋，除主持、参与集体科研项目写作之外，他还写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还在全国或地区性宗教研究工作会议上经常发言。他胸襟袒荡，无所畏惧，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萧志恬过世后，大家怀着无限怀恋，为了纪念他在宗教研究工作中的成就，特地编辑出版了这本论文集。全书共收学术论著、调查报告30余篇，都是精心之作。这些论文和报告都已公开发表在国内报刊上，如《宗教》、《学术月刊》、《宗教问题探索》、《当代

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社会科学》、《民主与法制》、《上海理论》、《新民晚报》等。

任何学术研究固然应当贯彻“双百”方针精神，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并敢于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所有这些，都必须符合党的现行方针政策，有助于“佛头开花”。这也应当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前提条件，任何人都必须遵循的原则。

综观萧志恬的论文和报告，都是以全面而又正确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

萧志恬同志的道德学问将作为一种宝贵财富流传下去。他的死，使我失掉一位长期合作的有力伙伴，同时也使宗教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丧失了一员闯将。我们必将永远铭记他的好作风和好学风，并继续发扬光大，并以此作为永恒的悼念。

1994年5月末

目 录

【序言】.....	罗竹风
-----------	-----

理 论 探 索

“四人帮”搞的是宗教吗	(3)
对当前宗教现象的几点看法	
——读《社会调查研究八题》而引起的联想	(8)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	(16)
试论我国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问题	(28)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	(43)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	(50)
宗教的长期性再思——基督教热的启示	(61)
十九号文件是正确估量形势和指导实践的指南针	(69)
四十年来基督教宗教活动框架的变迁	(76)
理论与实际结合之树常青	
——学习罗竹风在宗教研究方面的治学精神	(87)
再谈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认识	(104)
学习小平同志讲话 漫谈当前宗教问题	(111)
我国现阶段“宗教改革”商榷	(119)
爱的升华——纪念吴耀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127)

调 查 研 究

我为什么皈依佛门	(139)
----------------	-------

基督教圣经进修班

——浙江基督教见闻之一·····	(142)
浙江农村青年信教原因举例·····	(149)
上海市区基督教受洗情况的调查报告·····	(155)
苏北农村宗教问题考察报告·····	(161)
改革开放与宗教问题——温州见闻的思考·····	(171)

评 论 建 议

关于不再使用“地下宗教活动”提法的建议·····	(183)
对《团员要去当尼姑的教训》的意见·····	(185)
“宗教渗透”说商榷·····	(187)
现阶段的宗教是“社会政治问题”吗·····	(190)
对宗教问题宣传的一点看法·····	(193)
也谈信教与“吃教”·····	(195)
现代化建设与宗教信仰自由·····	(197)
“奉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社会”质疑·····	(203)
一字之差——从“宗教职业人员”改为“宗教教职人员” 想起·····	(208)
现阶段“宗教改革”异议·····	(210)

附录:

两千女基督徒的见证

——上海基督教妇女大会旁听记·····	(217)
萧志恬学术成果年表·····	(220)
后记·····	萧咏红(223)

理论探索

“四人帮”搞的是宗教吗

1979年2月，在云南昆明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这样性质的会议。会上，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宗教研究的任务是，必须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新宗教”、“新神学”，说“我们要进行史无前例的四个现代化，凡是对四个现代化起着障碍作用的，我们一律扫除”，其中包括“宗教禁欲主义”。①

在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愤怒地申诉这一伙反革命集团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极力制造“个人崇拜”的迷信。他们神化领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奉若宗教教条，推行“三忠于”、“早请示、晚汇报”等类似宗教祈祷的活动。这种揭发批判，形象生动，给广大群众以深刻的教育，是很好的。但是，把林彪、“四人帮”推行的一套反革命舆论和手法定名为“新宗教”、“新神学”，认为“神学中危害最大，禁锢人们头脑最严重的一种神学，就是林彪、“四人帮”十多年来鼓吹的新神学”。②把这种“新宗教”、“新神学”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列在一起，作为宗教研究的对象，要求联系揭批林彪、“四人帮”，批判宗教神学，为四个现代化扫除思想障碍，这就值得商榷了。

一切事物有其一定的界限，即质的规定性。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③相信和崇拜超人间的、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神灵，是宗教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基本区别之一，而林

彪、“四人帮”鼓吹的“个人崇拜”并不具备这个特点。封建时代的统治者皇帝自称为受命于天的“天子”，要臣民顶礼膜拜，盲目效忠。尽管这种“忠君”的思想形成和传播借助于宗教意识，然而我们却不把它列入宗教的范畴，而称之为封建主义思想，与宗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把一切盲目崇拜的现象都称之为宗教，那就扩大了宗教、有神论这些特定的科学概念的范围。

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④在阶级社会里，宗教为剥削阶级所利用，要劳动人民甘心忍受现实的苦难，寄希望于虚幻的天堂来世。各种宗教的许多信徒，往往是遭受残酷的剥削压迫，无法抗拒，消极厌世，求助于宗教，幻想得到“来世”的幸福。然而，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个人崇拜”甚嚣尘上时，广大劳动人民和干部一度受蒙蔽，乃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敬仰。他们渴望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使现实生活更美好、更幸福。而当他们一旦察觉到林彪、“四人帮”这套鬼蜮伎俩是阴谋篡党夺权，给人们带来的是政治迫害和经济贫困时，他们就开始怀疑、抵制、直至勇敢地进行斗争。显然这同教徒的宗教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以批判宗教神学作为肃清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的手段，那就不是有的放矢了。

有一种现象是令人深思的：在“四害”横行时，有些宗教徒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对林彪、“四人帮”推行“个人崇拜”的一套舆论和活动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他们声称只相信天上的神，反对把人间的政治领袖当作神来崇拜。这就从反面说明，林彪、“四人帮”推行“个人崇拜”所依赖的社会思想基础，并不是宗教神学。这个思想基础与其说是“上帝”观念，不如说是“帝王”观念，即几千年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影响。只有彻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提倡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方能从根本上肃清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

批判“新宗教”的提法，理论上值得商榷，实践上更是有害的。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及于全国各条战线，显然不是炮制了一种什么“新宗教”，而是推行极左路线，肆意践踏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他们实行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砸烂”执行宗教政策的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取消宗教工作，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打成“牛鬼蛇神”，进行批斗；他们强行关闭和占领寺庙教堂，禁止一切宗教活动；他们把无神论当成一根政治棍棒，乱抽乱打，大搞向宗教宣战。这一套倒行逆施，伤害了教徒的宗教感情，破坏了人民内部的团结，造成部分信教群众对党的宗教政策的怀疑，从而影响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同时，社会上极少数坏人勾结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这种情况，制造混乱，乘机捣乱破坏。这些因素使宗教方面的矛盾呈现错综复杂的状况。因此，当前在宗教领域的首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坚定不移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信教和不信教都有自由的基本权利，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打击少数利用宗教进行破坏活动的坏人。这样，就提供了有利条件，使我们可以大力开展信教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宗教现状的研究，应当为此正本清源，批判左倾思想。试想，在这种形势下，不首先进行如上所述的调整关系的工作，而大力号召批判宗教神学，把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扩大化，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解放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残余势力的造谣挑拨，许多宗教徒受蒙蔽，担心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恐惧，甚至一定程度的对立情绪。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我们

不是着眼于批判神学，而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对宗教徒进行耐心细致的以反帝爱国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即求政治上反帝爱国之同，在宗教上存有神无神之异，团结对敌。实践证明，这种作法，团结了广大宗教徒，对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四害”横行的日子，广大宗教徒同全国人民一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现在又共同投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种团结、爱国、进步的精神，正是解放以来执行党中央在宗教问题上正确的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今后应当遵循的。

列宁指出：“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阶级关于天堂的意见一致更为重要。”^⑤ 在我们面临历史性重大转折的今天，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是团结一致搞“四化”，为实现这个共同目标，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只要处理得当，有一部分群众信仰宗教，那是无碍大局的。对于他们，当前需要的是落实宗教政策，使他们消除余悸；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为四化作贡献的社会主义觉悟。给宗教信仰问题无限上纲，跟“四人帮”挂钩，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作法，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造成政策思想上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恐右症”尤为突出。有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口头上承认要落实宗教政策，心里却想当然地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扫四旧”现在还会有多少人信教呢？贯彻宗教政策，反而助长宗教“回潮”、“泛滥”，宗教是“鸦片”，妨碍四化建设，还是宁“左”勿右为保险，这些想法和做法，不符合客观实际，违反唯物主义的原则。当前摆在宗教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应当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中国实际，总结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研究宗教问

题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帮助人们正确地处理宗教问题。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抽象地提出反宗教斗争的问题，不应当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来进行反宗教的斗争，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在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⑥当前我们面前最大最实际的斗争是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宗教研究工作应当服从于它，并为它服务。

【注释：】

①② 《世界宗教研究》第1集，1979年8月出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⑤ 《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第380页。

对当前宗教现象的几点看法

——读《社会调查研究八题》而引起的联想*

1981年10月出版的《社会》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社会调查研究八题》的文章(同年12月8日《文摘报》转载)^①。作者说:在我们搞社会学,应当重视调查我国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接着提出了当前首先应该调查的八个题,并将“宗教信仰问题”列为八个课题之一。文章说:“二十多年前,对于宗教的信仰渐渐淡薄了,可是近年来虔诚的教徒渐渐多起来了。……1980年8月17日,前往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做弥撒的竟多至三千多人。这是二十年以前所不可想象的。说明有些人的精神寄托已渐渐转向宗教。”这段简单的文字中,虽然有些说法还可以商讨。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就当前宗教情况进行社会调查,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对于开展宗教问题的研究,配合搞好党对宗教的工作,都很有必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各地陆续恢复开放了一些宗教场所,十年被剥夺了信仰自由权利的宗教信仰徒们,纷纷回到教堂寺庙,参加宗教活动;也有些原来不信教的人,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以至成为新的信徒。对于这种现象,人们议论颇多。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呢?唯一的办法是

*本文获上海社会科学院1978—1984年科研成果奖。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继承我党的优良传统，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②因此，我们热烈响应就当前宗教问题进行社会调查的建议。本文拟补充一些情况，提供几点意见。

（一）关于当前参加宗教活动人数增多的问题。

以上海的情况来看，几个宗教的情况是不同的。就从三千多教徒望弥撒这件事说起吧。在旧中国，上海是天主教影响较深的大城市。解放时，市区有大小教堂几十座及教会办的一批学校、医院和救济事业等。市区有教徒五万人，包括郊县在内共有十多万人，仅徐家汇天主教堂就有一万多人。尽管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二十年前，即1962年5月（“圣母月”），前往郊区松江佘山天主堂“朝圣”的仍有一万多人（当然不都是市区去的）。1980年8月，上海市（包括十个郊县）只恢复了一座天主教堂，即徐家汇天主堂（现已增至7所）。因此，8月15日（注：不是17日）——天主教每年四个主要节日之一“圣母升天节”，从上海市区和郊县共有三千多教徒前往徐家汇天主教堂望弥撒，并不算多。

佛教方面，今年春节第一天，前往玉佛寺烧香礼佛的一万多人，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如果考虑到上海市区原有大小寺观几百座，每逢春节都有大批善男信女烧香拜佛的传统习惯，我们就可以比较冷静地来观察这一现象了。

上海参加宗教活动人数较多的是基督教（注：指新教，下同）。现在市区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有两万多人，较之“文化大革命”前夕显著增加。但是，如果把时间推移到更远一点来看：上海解放时市区有基督教徒四万多人，1958年，全市基督教堂合并，实行联合礼拜，1961年和62年圣诞节，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仍稍稍超过两万人（平时只有一万多人）。因此，从参加宗教活动的